

罗三洋 著

新三国

袁绍
篡位阴谋破产记

他曾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他曾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登上九五之尊；他曾公然以皇帝的年号为自己冠名，却与龙袍擦肩而过；他虽为一个时代的主宰，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而被肆意嘲笑……

一张刻意编织的迷宫般的大网，掩盖了前三国时代那段枭雄乱世的历史真相。

袁绍，一个阴谋篡位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冤屈”要向后人表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序篇 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1
第一章 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8
一、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8
二、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18
三、官方“鼓励”的叛乱：	21
四、圣人或是魔鬼的诞生：乱哄哄的本初元年	31
第二章 宦海沉浮：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摔倒”	41
一、枕边风要不得：“妻管严”梁冀的胡乱统治	41
二、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48
三、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54
四、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64
第三章 浮出水面：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73
一、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73
二、金钱的力量：倒向宦官的军官群体	83
三、本初俱乐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诞生	88
四、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	96
第四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	107
一、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107
二、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	116
三、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	125
四、一石二鸟：与宦官同归于尽的何进	131
第五章 乱世枭雄：短暂的兄弟联兵	140
一、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迫出逃的袁氏兄弟	140
二、十八家诸侯讨董卓：袁绍出奔的第一个成果	150
三、成也袁绍，败也袁绍：没有统一战略目标的乌合联军	157

四、屠刀南指：袁绍的扩张与兄弟决裂	166
第六章 群雄逐鹿：炎汉的烈火在燃烧	174
一、英豪本色：孙坚之死与界桥之战	174
二、血染长安：董卓遇刺与李、郭汜的反击	184
三、丧家犬的出路：频繁易主的吕布与袁公路的皇帝梦	190
四、乳虎啸林：初试身手的孙策	199
第七章 鹰扬河朔：袁绍、曹操的亲密协作	203
一、没用的爪牙：损兵失地的曹孟德	203
二、力挽狂澜：袁绍帮助曹操战胜吕布	210
三、祸起萧墙：袁绍消灭臧洪，分封诸子	215
四、放虎归山：“无私”帮助孙策、吕布独霸一方的袁公路	222
第八章 自掘坟墓：袁氏兄弟的黄粱皇帝梦	226
一、天子下席：李、郭汜的内讧与献帝东迁	226
二、拱手相赠主动权：袁绍命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	229
三、最后的忠诚：曹操送来的大将军	237
四、僭号“仲家”：袁术称帝之谜	247
第九章 空为他人做嫁衣：并吞河北四州的大将军	255
一、藕断丝连：袁绍与曹操的最后合作	255
二、白门缚虎：曹操消灭吕布	266
三、鬼神之争：袁绍消灭公孙瓒与袁术败亡	270
四、历史上最大的黑社会内讧：整军备战的袁绍与曹操	283
第十章 龙战官渡：空前绝后的主仆对决	287
一、重操旧业：暗杀孙策后暂时可以单线作战的曹操	287
二、风雨乌巢：一只黑乌鸦带来的绝妙战机	298
三、“扫帚星”陨落：死不瞑目的袁本初	312
四、袁氏集团的覆灭：重新上演的兄弟反目肥皂剧	317
尾声 挥之不去的本初阴魂	326

序篇 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袁绍完蛋了，彻底沦为历史的配角，可阴魂却长期徘徊不散。

因为袁绍，曹操错过了南征的最佳时机，与统一中国的荣耀擦肩而过，于是国家只好一分为三。因为袁绍，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大同盆地，成为中原王朝长久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误读了袁绍，谭嗣同亲手断送了维新大业。误读历史，是多么的可怕！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

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又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

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

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最后却成了曹操最大的敌人；

他曾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开启一个新时代；

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沦为历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个时代的主宰者。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游荡徘徊。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帝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瓦解；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袁绍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乃至之后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的历史纷繁复杂，对同一事件，不同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罕有其匹。如果将有关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配角反而升格作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晋

升为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们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们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汉末英雄记》、《三国志》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东晋末期，袁宏搜集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部分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部分地保存了下来，值得重视。不过，有些史籍的写作立场严重偏袒曹魏，内容也常常自相矛盾，可靠性并不都很高，其价值需要分别评估。

《三国志》和《后汉书》固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能取得巨大成功，已经反衬出，读者们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的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结果形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到：由于最终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经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吞并袁家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丑化，一点都不冤枉。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曹操的胜利显得顺理成章。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今人绘袁绍陈寿在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曹操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只字不提董卓、吕布、刘表、袁术、刘备等人。范曄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表、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五年使孙权得以巩固统治，刘备得以网罗诸葛亮等人才，最终令曹操蒙赤壁之辱。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却都无法动摇其优势地位。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但史书中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处。单就兵力而言，《三国志》中说曹操先收编了 30 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在官渡之战时如何会“兵不满万”？《三国志》又多次强调，袁军“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果真如此，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

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连平庸之辈都可以轻松打赢，曹操为何打得如此艰苦，一直没有主动进攻？这岂不是说明曹操愚蠢无能吗？杰出的军事家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长期艰苦的对峙之后，勉强击败了一个在能力和实力上都远远逊于自己的无能之辈，而且只是将南下进攻自己的袁绍赶回了河北而已，难道真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即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曹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进行的。直到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太多的破绽。这才让我们有机会还原袁绍，重新审视汉末历史。

“曹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刘备和孙坚父子都曾经长期为袁绍或袁术效力，其属下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一个新皇朝。三国鼎立实际是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

但是，又一个疑问出现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集权统治下，袁家是如何攫取到如此巨大、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的？袁

家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史书中的袁家事迹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他筛选的。”作为书写历史的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者深知，如果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必须炮制出大量的虚假史料。另外，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也确实隐藏着太多的奥秘。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写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为“封禅”。到泰山封禅乃是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可见，刘备早有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杀了刘封改立刘禅，结果弄巧成拙，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蜀汉政权必将亡于刘禅之手。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就笔者所知，“公路”一词最早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与“公行”、“公族”并列，最初可能是官名，后来演化成对世袭贵族的代称。袁术取“公路”为字，无疑是在炫耀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还不满足于此。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僭号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有直接关系。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传统，古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

同辈的“名”。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时仍要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特殊的一个。我们不会看到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 146 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地位本来较为低下、疏远。就亲缘关系而言，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袁家的领导权最后却落到袁绍手里，这也成为袁术后来痛恨袁绍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在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 140 年即位时定年号为“建元”，此后每六年改一次年号（即所谓“改元”）。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汉朝人取“名”沿袭了先秦习惯，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这些常用“字”，所以两者暂时相安无事。

东汉、魏晋时期，个人取“名”、“字”仍旧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等人在开玩笑时，还曾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据清朝学者周广业在《经

史避名汇考》一书中的考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始自晋惠帝“永康”年间，当时吴兴郡的“永康县”被改名为“武康县”。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疑问越多。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肯定便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末世东汉——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希望通过本书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笔者的朋友王晓明先生为本书制作了多幅精美的地图，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涉及大量疑难问题，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欢迎各界读者指正。为了与古籍中的数据相合，本书中的人物年龄均采用中国传统的虚岁，月、日均用东汉后期的官方历法《四分历》，以汉字“一、二、三”表示；年份均依学界惯例用公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按照国际惯例，公历分成两个部分，公元 1582 年 10 月 4 日以前用古罗马《儒略历》，此后用《格利高里历》。这两种西方历法与中国传统纪年都相差数十天。如未加特殊说明，本书中提到的年、月、日都沿用《四分历》。因此，每年年底的几十天其实都应划入公历的次年。如汉桓帝死于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日，在本书中写作“公元 167 年十二月丁丑日”，但按照《儒略历》和《格利高里历》，此时已经是公元 168 年 2 月了，而且这两种西洋历法之间当时也已经相差 1 天。

本书涉及的史料较多，如一一注明出处，势必影响读者的阅读。因此，书中凡引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全后汉文》、《全三国文》等常见史料之处均不作注释。

为使本书的内容更加简明易懂，笔者将书中涉及的大部分文言文译成了白话文。由于功力有限，不能保证所有翻译都切合原文含意，一切内容都应以原文为准。。

罗三洋

2008年3月

第一章 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一、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大约公元140年前后，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新婚夫妇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郎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新娘则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作为朝廷要员，袁汤和马融在社会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子女的联姻自然也会备受世人关注。

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大部分时间处于空缺状态的太傅。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以上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自设有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等。

在地方，东汉全境被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部分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只能由刘姓皇亲出任，直接向皇帝负责。

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一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县长。

太仆袁汤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南郡太守马融则是地方官员，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每月有 180 斛粮食；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每月 120 斛粮食。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按当代价格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 8 500 元人民币，马融约为 5 700 元斛即石，汉代 1 石粮食通常指 26 4 公斤未去壳的小米。小米去壳后，仅余原重的 60% 左右，所以汉代的 1 石粮食大约相当于 15 8 公斤去壳小米。现代去壳小米的市场零售价约为每公斤 3 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婚配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两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是开国元勋、名将马援的侄孙。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做了皇后之后，马家便开始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

马融此时的东汉帝国正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曾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渊博的学者。

和孔子一样，马融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 400 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 50 余人。除了这不足 500 位高徒之外，其余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家求学，过了三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

糟糕的是，马融生活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除了公孙瓒和刘备的老师卢植之外，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后世的学者讲课因此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的俸禄很难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四处贪污受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尽管马融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但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公孙瓒、刘备等人正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等则是郑玄的学生，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开国元勋，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上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做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内，直到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逐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结合起来，由

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还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讖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想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 30 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 15 岁，却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海如流”蔡邕《袁满来碑》，载《蔡邕集》。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

汉代民风淳朴，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力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被誉为“长者”（厚道人）为荣，袁安正是一位典型的厚道人。年轻时，他在县衙门里担任小吏，以拒绝收受贿赂闻名，故而经济拮据。一年冬季发生雪灾，饥饿的穷人都四处借粮，袁安虽然也已经揭不开锅，却闭门不出。几天后，县令视察灾情，见袁安门前的雪地上竟然没有脚印，估计他已经饿死，连忙带人进去收尸，却见袁安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县令问他为何不出门借粮，他回答：“大雪时，人人都受饥饿之苦，我不宜前去打扰。”后人因而以“袁安困雪”代指坚守节操的穷困之士。

见袁安如此厚道，县令非常感动，便推荐他为“孝廉”，袁安的仕途从此开始。假若当年那位县令视察袁家的时间晚几天，袁安恐怕难逃饿死的命运，也自然不会有后来连续六世的飞黄腾达，更不会有袁绍、袁术兄弟争霸天下。区区小事却能彻底改写中国历史，可见人命足以关天。

大约在公元 60 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轻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

反而在 70 年被指控谋反，丢了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有上万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恰在此时，袁安被汉明帝委任为楚郡太守。他一如既往地宽以待人，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83 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身边的，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很少坐轿（除非生病），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輿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偶尔也能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外，太仆往往会是皇帝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轻易不会泄漏机密，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对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 86 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后，袁安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这样解释：“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则无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充耳不闻”的成语。无论是冕旒还是统，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 12 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板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九串赤玉珠，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七串青玉珠，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五串黑玉珠，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

除了制服有改善外，升任三公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包括 48 至 71 名幕僚。在幕僚中，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 89 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袁安对此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仍然批评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的主张，与窦宪的意见完全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他。

92 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发动政变，摧毁了窦宪集团，并给受了“委屈”的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加官晋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欧洲以匈奴人为原型的半人马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是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 12 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 20 岁的“冠礼”上取“字”，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184）去世，享年 63 岁，所以她应生于公元 122 年。汉代女子通常在 15~20 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 137~141 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要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女方家族也要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有权不出屋，这样